

古海门县治所在现代的位置

□黄志良



发现海门

海门县原为长江口的沙洲——东布洲。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于东布洲始置海门县。与大陆合并的时间大致在海门知县沈起筑沈公堤之前(1054~1056),曾为下辖120里的壮县(区划名称,1里为110户)。元朝末期至明朝初期中叶,长江入海主流移至北支,引起北岸崩坍,县治四圯四迁,元至正年间(1341~1368)县治一迁,二迁在礼安乡,约今下三和镇(今悦来镇镇兴村)附近。明正德九年(1514),三迁通州余中场,约今四甲镇合兴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四迁金沙南场,约今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通灵桥村与元帥庙村。这时的海门寄居州境的侨县而已。清康熙十一年(1672),县城被潮水冲坏,吕四场改属通州,所存土地仅39顷54亩,五迁永安镇,约今东社镇一带,废县改称静海乡,并入通州。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永安镇又复圯于海,择置徐涇迁居,聚处为兴仁镇。

一、958年海门县治所在现代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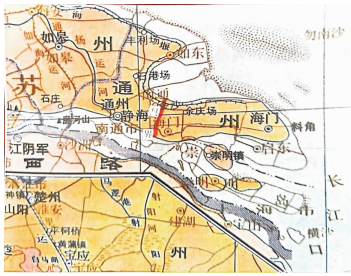


图1 北宋政和元年(1111)的海门县位置图

根据北宋政和元年(1111)的海门县治所位置(见图1),量算的经度为E121°41′(每分间距1.55公里),纬度N31°54′(每分间距1.65公里),转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1983年出版的《南阳村》幅,其位置在南阳村东昌镇东南角(现称启东市南阳镇东昌镇村)(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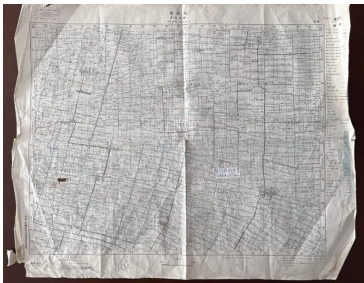


图2 古海门县治所在现代的位置

二、四迁海门县治所在现代的位置

对于四迁海门县治所的位置众说纷纭。《海门市志》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县治西迁金沙场之南通州境内的瞿灶、进鲜两港之间(今通州市袁灶港、海坝桥以西)。

北宋太平天国年间(976~984)建余庆场。元至元三十年(1293),析余庆场为余西,余中,余东三场。据清嘉庆五年(1800)邱标等编纂的《两淮通州金沙场志》中说,金沙场“东至余西场十二里,西至西亭场界五里”,从新中国成立后南通县行政界线来看,1985年,进鲜港为金沙镇与金余乡,金乐乡与袁灶乡之间的界河,运盐河北北相邻的竖河为余丰河,将图上标出了县界(见图1)。

利用有关地图转绘到现在的地图上,1111年的海门县在位于1054年至1056年所筑的沈公堤北侧。1582年的海岸线在1587年的姜公堤北侧,江岸线在吕通公路南侧,符合1916年测绘的1:50000地图标注的沈公堤,姜公堤,吕通公路的位置,说明这些地图符合实际情况(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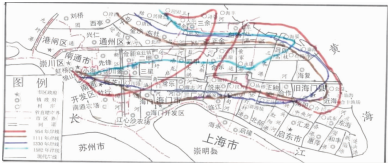


图3 954、1111、1330、1582海门县位置变迁图

根据明万历十年(1582)的海门县治所位置(见图4),量算的经度为E121°05′,纬度N32°02′,转绘到1983年的《南通县》幅,再转绘到1916年的“南通”“金沙”1:50000地图上,查到了进鲜港依然存在,1985年为金沙镇与金余乡,金乐乡与袁灶乡之间的交界河,现为三级河。据当地老人回忆,瞿灶港自南向北起自侯油榨镇东药师堂西侧向北经英芝桥,望夫桥,李家桥,丁家桥,三里镇,曹家園,在双土地堂东南折向东北,至金沙镇西北与运盐河交汇,全长约6公里。1958年9月开挖竖石河(现称新江海河),致使瞿灶港失去了水上运输功能。从1916年地图上可以找到侯油榨镇和三里镇,大致画出了瞿灶港位置。



图4 明万历十年(1582)的海门县位置图

据当地人回忆,利和镇在唐代中

期(约公元9世纪)已是一个很兴旺的市镇,位于现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的袁南居委会中1985年的南海村,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江潮疯狂侵袭,将利和镇吞没。

从《南通市区水利志》和《南通市县水利志》及1916年地图来看,从东濠河向东,经龙王庙和三里墩北侧,再到观音山,三圩镇东有条古河道,现称通甲河,当时可能为南串场河与舒纓开的河道相连。

笔者根据上述资料查得四迁县治在今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的通灵桥村与元帥庙村之间,北起通吕运河,南至吕通公路,南北长2.7公里,东西宽2.2~1.3公里,图5、6、7绘制了四迁县志遗址图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四迁县志图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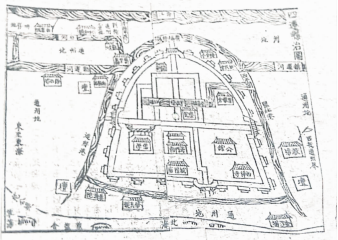


图5 四迁县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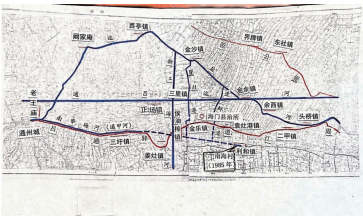


图6 四迁县治在现代的位置图(一)



图7 四迁县治在现代的位置图(二)

一个海门籍老战士记忆中的抗美援朝战争

□吴卫东 薛卫菊

唐金池,1931年8月出生,南通市海门区四甲镇人。1947年5月在海门参加地方区中队,1948年到南通部队成正规军,后调到山东济南加入新成立的炮兵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等战役,历经的战斗有大大小小百来次。1976年转业到海门县四甲人民公社工业办公室,1980年到四甲镇食品站工作,1991年离休。

今年是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为了致敬志愿军战士,纪念这段光辉历史,2023年4月28日,我们赴海门区四甲镇走访了唐金池老人。

听说我们要来探望他,唐金池早早地便穿戴整齐,在门口迎接我们。他虽然身形瘦弱,但精神矍铄、热情洋溢,完全不像是92岁的老人,从他身上依然可以看出军人的飒爽英姿。当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老人打开了话匣子,与我们聊起了他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回顾了那段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

一、跨过鸭绿江

“我于1947年5月在海门四甲参加革命,后随部队调到山东济南。部队在建立炮兵时,由于我文化程度相对高一点,头脑灵、体质好,所以被选为炮兵,并进行了系统的火炮操作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炮兵。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大大小小百来次战斗。1950年,我所在的炮兵部队参加了国庆阅兵,阅兵结束后就接到命令,要求参加抗美援朝。”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抗美援朝”。唐金池跟我们如是说,“后来,指导员跟我們说,就是要我们抗击美国侵略军,支援朝鲜人民军队,战士们一听就懂了。于是,我们所在的部队从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了河北唐山。到唐山后,营团干部到师部开会,连排干部到营部开会,班组动员各位战士。通过传达学习,我们统一了思想。”

“那时已经是10月份,北方的天气特别寒冷,而发给战士的棉衣是南方战士过冬穿的,棉衣的棉絮少而单薄,重量只有四斤。我们都说:有的穿总比没有穿好吧。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沿路我们看到火车上装载了大量面粉,烙成的饼堆得很高,这个大饼很大。特别是山东烧饼,巨大且



坚硬。不容易变质。到10月底,我们炮兵出国作战,从河北唐山坐三天三夜火车到东北安市(现辽宁省丹东市)。”

“这时,鸭绿江上的大桥已经全部被美军炸毁,对面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一片漆黑,上级命令高炮营架桥,桥架好后,我们顺利进入朝鲜北部地区。我们到朝鲜的第一个地方叫山坡里,这个地方离中国边境只有120里,直线距离只有60里。之前美国侵略军对该村村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许多难民纷纷逃到了中国边境。美军在这个村庄里建了一个重炮阵地,还建了一个飞机场,对我国边境及东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克服天气寒冷的巨大困难,爬雪卧冰,与美军进行了坚决的战斗,把美军炮阵地和飞机场摧毁,解除了对我们东北地区的威胁。当我们的后勤人员打扫战场时,看到我们的战士牺牲的壮烈场景,都忍不住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当唐金池讲到这里,含泪高声说:“可惜啊!可惜。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零下三十七八度的战场上,与美帝国主义军队进行了英勇作战。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多么珍贵的生命!只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才有这样的顽强意志和牺牲精神。”

二、进驻铁定山

“1951年春天,我们所在的部队

进驻朝鲜中部一个叫铁定山的地区。我们的指导员给我们讲,这个地方是大唐名将薛仁贵征东时到达过的地方。”

公元666年,大唐对高句丽再次进行东征。此次战役中,薛仁贵带领3000多大唐兵大破高句丽大军,解救新城危机,占领重镇扶余城。后来大唐军所到之处,高句丽的守城士兵纷纷投降,薛仁贵所部连攻40城,成就了至今尚未被打破的军事神话。于是,高句丽举国投降,唐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共四十二州一百个县。并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治理高句丽。薛仁贵任正三品右威卫大将军兼检校安东都护,封平阳郡公,受命领2万兵士,以刘仁轨留守平壤。

“对这段薛仁贵征东的历史故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家觉得,誓死保卫好这块土地是历史赋予中国军人的神圣使命,事关国家尊严,事关世界和平,无论面临怎样危险的作战,怎样的困难,绝不能让美国军及联合国军侵占朝鲜的狼子野心得逞。”

三、炮兵肉搏战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连续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至“三七线”附近,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由于接连作战,志愿军从1951年1月8日起转入休整状态,计划在两个月后再发动攻

势。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发现,志愿军在进攻后7天内必须结束战斗,转而进行补给,他把志愿军的这种战斗方式称为“礼拜攻势”。

1951年1月25日,自以为窥得志愿军破绽的李奇微指挥23万余人,发起了“霹雳行动”,向志愿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妄图以此来达到美军的战略目的,唐金池所在的部队负责阻击敌人。

“当其他部队撤退后,我们炮兵正要撤退时,上级发来战报‘兄弟部队已经撤退’。而此时我们的野战医院还未撤退完毕,正好被美军的一个小分队包围。上级命令我们扔掉火炮,立即轻装上阵,赶赴野战医院增援营救。指导员告诉我们,美国兵体大腰圆,硬拼难以打倒他们,要充分运用各种工具不让他们抓到并战胜他们。当我们急行军赶到野战医院,美军正在把中国的医生、护士、伤员一个个地往卡车上扔,总共装了五辆卡车。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针对美军迅速进行了冲锋,并与他们展开了肉搏战。面对凶残的敌人,战士们用刺刀刺,用石头砸,用牙齿咬。由于我身高大体壮,美国兵抓不住我。我就先用枪刺,刺刀弯了,用枪托砸,枪砸坏了就捡了一根树枝,见敌人就打,最后看到一把铁锹,我抡起来在敌人头上乱飞,我总共打倒了多少敌人,当时也没有仔细清点,估计十来个敌人总是有的。”

“面对我们的拼命肉搏,敌军支撑不住,立即驾驶了最前头的两辆卡车落荒而逃,我们解救了其中留下的三辆卡车的医生和伤员。上级领导立即组织追击小分队,向美军逃窜的方向追击,最后全部救回了野战医院医生和伤员,我们炮兵连受到上级部队的嘉奖。”

唐金池感慨地说:“我们的战士真是英勇。在武器枪炮落后于美军及联合国军的同时,由于没有制空权,志愿军不仅每日每夜地被敌机轰炸,后勤补给也非常困难。朝鲜北部的冬天奇冷无比,都是零下三四十度,战士们穿单衣,吃高粱饭。最困难的时候,每个战士只能分到三个土豆,烘烤时是软和的,但拿到战士的手里就冻硬了,咬不动了,经常牙齿咬出了血。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作战环境里,志愿军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压倒,而是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用鲜血与生命维护了祖国的尊严,捍卫了和平,他们的付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永远铭记。”

故事里的卞之琳(连载)

第三辑 人文品格(二十四)

□丁士凤

(上接10月12日A7版)

33. 出书——“雅致的病痛”

著译诗文,卞之琳一向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总是精益求精。到了出版书籍,他则追求所出的新书臻于完美。

自登上文坛起,卞之琳为出书遇上了不少恼火的事儿。

1935年春,应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会特约,翻译世界文学名著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卞之琳毅然辞去《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务,专程去生活费用较低的日本京都友人处,数个月夜以继日辛劳,将此书翻译得相当成功,被人称赞为“胜如卞之琳本人的文学作品,又不失原文的准确性”。他回国将书稿交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会,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然卞之琳拿到新出版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看后却大为生气!因为,一是他精心编制的《英国王室世系图与首相表》,竟被考虑欠缺的编辑删掉,直接影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与掌握;二是他煞费苦心译出原参考书目的英、法、德文全名表,又被编辑去除,也会影响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学术研究;三是封面上原作者的英文名字,印错了一个字母。全面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卞之琳在昆明,他毫无办法,却总为此事耿耿于怀!

历经三十多年,卞之琳利用授课、工余等时间,坚持将最为难译的英国诗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来。之后,他在多位友人的协助下,有一个天然原英诗核对,搜集原作作者资料进行介绍,终于精编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英国诗选》,1983年交由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结果呢?有很多舛误,还将诗作者、诗题或诗的首行原文,印得丢三落四。卞之琳急了,只得一一列出“勘误表”,要出版社印刷后来入书中加以弥补。

再说《西窗集》,是卞之琳倾力所译西方名家的短篇精品力作汇编,以笔力精湛、意蕴深远著称,因而一向被广大读者看好。自20世纪30年代的初版,至80年代的再版,由几家出版社出书,也无不给译者的心中添堵。其主要问题在于校对不严,又有装帧草率等问题。

出书属于光荣,本该喜,但对卞之琳而言,出书简直成了他的一种“雅致的病痛”。

卞之琳著译等身,在他所出的书中难道没有感到满意的?虽然有,但是很少。

1936年,正是卞之琳诗创作的兴盛与高峰期。这年暑假他辞去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职返回北平(京),听说那里的琉璃厂文楷斋用木板刻印的书,就自行选编了一册诗定书名《音尘集》送去。先印样本十余册,他拿到手看了——整本书朴实大气,内页印刷清晰,行款整齐规范,文字与标点无差错,就惊喜交集!无奈当时囊中羞涩,未正式成批印行,但他很满足,说自己“算是过了一回出书的瘾”!在卞之琳逝世后的2000年12月9日,香港学者张曼仪根据卞之琳遗嘱,由卞之琳的女儿青乔驾车,两人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将一册《音尘集》和卞之琳于1937年8月在浙江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一卷《装饰集》,一并赠予馆内收藏。

此外,1982年香港三联书店印行了卞之琳的诗集《雕虫纪历》增订版,纸张鲜洁,版式玲珑,封面典雅大方,令人爱不释手。还有在1989年,台湾大雁书店出版卞之琳的诗集《十年诗草》新版,用了山茶纸精印,浑朴素净,简直为了一件出色的艺术品。学者江弱水在纪念文中说到:“卞先生题赠我一册,后来大约因为全送了朋友,手头一本都找不到了,于是写信到香港,叫我把那一本借给他。我现在正琢磨着是不是向青乔要回来呢。不知台湾的书局还能买到否?”

关于出书,卞之琳重在追求出版的完美。他还厌“大”爱“小”,就是不喜欢出臃肿冗长的“大部头”,而是爱好精练深刻的“小本子”。尽管他曾经创作有八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稿《山山水水》,因故自行废弃,但还是出了精美的小本子《山山水水》(小说片断)》。尤其他先后出版的新诗《鱼目集》《雕虫纪历》,既是小本子,又以“鱼目”“雕虫”含义谦称都为小,其实“小”中寓“大”,皆是杰作与妙品呢!再以前面提到卞之琳所译的《西窗集》来说,不仅是个小本子,而且汇编的都是短文章,但是广受读者的好评。就是在那段悼念卞之琳逝世的日子里,上海《解放日报》刊发的缅怀文章中,还有读者如此评说那小本子译作《西窗集》:“‘为了糊口’而翻译出如此美妙的书,真让人感慨。可以想象,卞之琳先生阅读的范围是何等博采宽泛,否则,要想漫不经心地‘信手’拈出这么多精妙的文字,绝无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为了‘糊口’,大概不会去选择这样的文字。不过以我的眼光来看,《西窗集》的生命力要比时下的很多畅销书更强大,更恒久。今天我很动情地写这篇读后感,便是一个证明。”

追求出书完美,同样的还有法国著名诗人马拉美,一生的追求就是“成就一本完美的书”。而中国杰出的诗人、翻译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卞之琳,一生既追求出书的完美,又是人品崇高,比之马拉美更胜一筹了。

(未完待续)



卞之琳研究